辽西有个大学村

■独家报道 □文／田睿

在辽宁西部，大小凌河的交汇之地，有一个不大的村落——凌海市余积镇小方村。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只有400户人家的小村，然而却声名远扬。据统计，这里20年来没发生过刑事案件，15年没有治安案件，10年来没有一次民事纠纷。最引人注目的是从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已有79人升入大中专院校，其中有4人考上了研究生，被人们誉为“大学村”、“状元村”。

关心孩子们的学习是村里的焦点话题

走进小方村，乍一看这里与其它北方农村并没有什么区别：纯净的空气、平坦的黑土地、零落的犬吠、缕缕的炊烟，一派宁静的田园风光。一旦你与村里人搭上话，便会立即感受到这里的话题不同凡响：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见面后谈论的，不是衣饰不是钱财，而是孩子的学习情况。在小方村谁家挣钱多，谁家穿着时髦并不让人眼热，而谁家孩子的成绩好肯用功才是最令人称道和羡慕的。重视教育已成为这里的村风，而且这种村风还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据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讲，明朝万历年间，孟姓和杜姓两家从山东迁移到井水清澈、甘冽的凌河岸边，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世代以种粮养马为生，此地人心方正，故其村名为方正堡，后边加一“小”字以示自谦，后来经世代演绎、简化为小方村。这个村祖祖辈辈酷爱读书，清末宣统年间出了最后一个秀才。小方村这种重视教育的传统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世代积淀、沿袭的结果。

在现代社会，只要想生活得好一些，便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在这个问题上小方人站得更高，见地不俗：要致富先治愚。

小方村集体经济并不发达，但村里在教育上却舍得投人。从1969年起这个村就办起了幼儿园，教师都经过专业培训，教材与教具和城市中等幼儿园不相上下，他们谙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必须进行早期智力开发的道理。前几年，投资23万元建起了幼儿楼、翻建了小学校舍，升学率达到百分之百。小方村在镇里不是最富的，但他们的幼儿园和小学校却是镇里一流的。从小方村毕业的学生，到了镇中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在小方村，村民的吃穿用都很节俭，可唯独孩子们的学习费用不能省。每个学生都订一份报刊，即使是育红班里的小娃娃也人手一册《好孩子画报》。村里每户人均买书、供孩子上学的钱要占收入的40%左右。村民手里有了余钱，不是先盖房子，而是先给孩子们买书藏书。

三间平房换来一个大学生的故事

原村党支部书记老孟已年过半百，他平时省吃俭用，家里没有一件象样的家俱，最值钱的要算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前年，他终于倾其所有，盖起了三间宽敞的平房。没事的时候，老孟总爱坐在小院里的那株大枣树下，眯着眼睛仔细端详自己那崭新的房子，每到这个时候，总有一种幸福和踏实的感觉在心中涌荡。是啊，苦熬了大半辈子，该是享享清福的时候了。

不久，二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寄来了，可谓是锦上添花、喜上加喜。可老孟捧着那张期盼了很久的纸片，却怎么也乐不起来。大儿子正在大学读书，花费已经不小，这次老二考的是美术学院，又是自费生，是需要一大笔钱的。老孟走亲串友借来借去，也没凑足那3万元钱。最后，老孟把目光落在了那三间“北京平”上，心里真的不舍呀！在农村，房子几乎是一家人的命根子。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老孟把心一横，卖房子！老伴一听，躲到边上偷偷地抹起了眼泪。

听说老孟要卖房子供儿子念书，亲朋好友大多赞成，也有人劝他三思，人老了总该有个安身之所，可老孟说：“我们已经老了，吃了一辈子没文化的亏，说啥也得让孩子们多读些书，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耽误不得。”

现在，老孟和老伴仍然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可他们却有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满足感。他们真正地懂得了自己能给孩子们留下什么基业。

4个子女同登金榜的人家

在小方村，提起刘凤庚一家，大家都显出敬佩的神情，因为尽管家境贫寒，夫妻俩却将4个子女都送进了大学。

今年55岁的刘凤庚是余积镇中学的副校长，他的妻子也是教师，夫妇二人都是老三届。在那个年代，他们是村里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家，自然对下一代学习的重视程度也比其他人家高。

刘凤庚教子有方是村里有名的，他曾总结出自己的三套法则：一是注意早期的智力开发。孩子们4、5岁的时候，他每次到外地出差，很少带回吃的东西，可孩子们总能在父亲的提包里惊喜地翻出一本本心爱的连环画、小人书。二是舍得智力投资。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8口之家，从孩子们上学的那天起，家里便没有谁穿过一件贵重的衣服，家里只有两只木箱和一张桌子。然而在教育上他们却从不吝惜，即使在工资较低的年代，每个月也要花上30元来给孩子们买课外书、参考书。三是以身作则。刘凤庚两口子同是教师，对待教学工作兢兢业业，常常是手不释卷。孩子们耳濡目染，自然而然的跟着父母学。每天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灯下各看各的书，虽然家境清贫，但也其乐融融。孩子们学习到深夜，刘凤庚就陪到深夜。每次考试成绩下来，考得好的不特别嘉奖，考得不理想的也不责骂，只要个人努力，那就足够了。

现在刘凤庚的4个孩子都已学业有成，大学毕业。大儿子读完研究生，分配到北京某研究所，二儿子分配到葫芦岛市化工研究所，大女儿在锦州热电厂工作，二女儿在锦州市太和区某学校任教。

在村里，象刘凤庚这样子女全部考上大学的人家还有8户，象刘凤庚夫妇这样教子有方的人家也还有很多。

小村里出了位副领事

走进郭中昶老人的家，你立即有一种倦鸟归巢的平实感和宁静感。4间老式瓦房，窗明几净，房檐下挂着一串串金灿灿的玉米棒子和红艳艳的辣椒。小小的院落拾掇得井井有条，显出主人的勤快和利落。

已经73岁的郭中昶老人，刚刚放牛回来，他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落。一谈起小儿子郭维勇，眼里立即闪出骄傲的神采。有这样一个出息的儿子，老人是有资格骄傲的。郭维勇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他从小就非常懂事，在学习上从不要家人操心，从小学到中学成绩在班里总是第一名。说起儿子的学习，郭中昶老人眼里涌出点点泪花。“这孩子没少吃苦啊！”

在锦县一中学读书时，郭维勇在别家寄宿，他知道家里困难，供他读书不易，同学们每月的伙食费是12元，他只花7元，为的是能给家里省下几块钱。数九寒冬，他舍不得买煤，晚上学习到深夜，冻得手脚发麻，就站起来在屋子里跑上几圈，待稍微暖和点，再坐下来学习，为此，手脚常常冻得又红又肿。

在学习上他从不马虎，一道难题也不放过，终于考入兰州大学，后又考入广州暨南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跨出国门，在美国任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副领事，那一年他才32岁。

郭中昶老人拿出一叠寄自大洋彼岸的照片，照片上那个英气勃勃、神采飞扬的小伙子，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小儿子。在竞争激烈、人才济济的美国，恐怕无人知晓这个才华横溢事业有成的小伙子，他的根扎在中国北方一个小小的村庄里。

郭维勇是村里至今走得最远的孩子。

让他三尺又何妨

走在小方村干净笔直的土街上，坐在小方村一户户人家温热的土炕上，你感受最突出的就是这里有一股浓烈的“雅气”和“正气”。

从小方村的自然环境来看，这里远离大都市的喧闹，远离现代文明的污染，距这里最近的是20多里地外的一个电厂，这里的井水特别清，也特别甜，从村里走出去的孩子们都说还是家乡的水好喝。更为难得的是这里的人心也很少受到来自外界的干扰和污染。

小方村人大都性情谦和。从村里人的嘴里你绝对听不到脏话、粗话。即使在文革时期，这里的村民也没受到什么影响，依然故我地养猪种地，避开那种你揪我斗的疯狂岁月。

小方村人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农忙的时候坐在田边读，农闲的时候稳稳地坐在家里读，在外结伴打工的男人们，寂寞的时候也大多是以书来排遣，而不去外出闲逛或结伙赌博。

读书对这里的人而言，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享受，小方村里的人，无论男女老少脸上都有一种书卷气。读书自然明理，有许多在其它地方令人头痛的难题在这里却可以迎刃而解。

譬如，村民孟昭更与杜秀滨，两家隔墙而居，相处和睦，但在翻建房屋时却因三寸之地闹起了纠纷。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和村长知道后，没有到现场，也没有直接找当事人调解、劝说，而是写了一模一样的条幅送到两家：千里修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尤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孟、杜两家人都识文断字，知道这四句诗的来历，双方感到非常惭愧。一张纸居然平息了一场要命的风波。

婚事和葬礼，对今天中国的农民而言是重大的事，而在小方村却办得很简单。从1988年起，村里就成立了公德协会，成员都是由村里推选出来德高望重的人组成，无论红事、白事均由他们处理。村里谁家的孩子要结婚，大家都去帮忙，婚礼那天，村里的人热热闹闹祝贺一番，吃块喜糖，然后新郎、新娘两家人吃顿团圆饭，也就皆大欢喜。绝不允许谁家大操大办。

村里谁家的老人去世了，都是由村里公德协会的人帮助料理后事，但绝不允许吹鼓乐、扎纸马搞迷信活动，而且全部实行火葬。如果有谁私自违反村规，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离去，再无一人相帮。因为小方村人讲的是厚养薄葬，老人在世的时候子女都要极尽孝道，而老人去世则无需讲究形式。这里的老人都能颐养天年尽享天伦之乐，所以老人活到八、九十岁在这里极为普遍。在人们惊呼道德滑坡的今天，这里的村民却能够牢牢地固守住传统美德的最后防线。

凡是到过小方村的人，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女人贤淑善良，这里的男人勤劳宽厚。没有文化不受人敬佩，不尊崇传统美德更无立足之地。

离开小方村的时候，是薄雾将散的清晨，回首望着这个溢满书香的小村，我突然觉得在喧嚣浮躁的现代社会，这里不正是我们千般探寻的净土和世外桃源吗！

闯荡美国的上海女人

■人生大舞台 □文／朱晓贤

杨澜的遗憾

在我要记述的三位丽人中，杨澜的层次也许是最高的。凭国家电视台黄金档名牌节目主持人这点就令人折服。后又独自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这就更无可争辩了。杨澜虽有大家闺秀风姿，但出身贫寒，她是凭真才实学加上聪明伶俐才时来运转的。那仅仅是一个偶然，那时她还是位大学外语系学生，她去应聘主持人，仅凭一席声情并茂的流利英语，居然就折服了中央台的评委们。杨澜一上台就闪亮无比，她的纯情质朴之美，她的伶牙俐齿的口才，她的艺术般风度，她的真诚微笑，她的敏捷反应以及恰到好处的与人默契征服了亿万观众的心，成为无可争辩的台柱式人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她是中国荧屏上一颗璀璨的明星。每当逢年过节、重大庆典、重大晚会，非邀她主持不可。无论哪里，只要她到场，便四壁生辉，杨澜的成功之路似乎是平坦的、幸运的。几年后她去了美国留学深造，攻读电视编导，她曾雄心勃勃，以创造更富意义的人生。然而，世界是复杂的，变化的。杨澜的世界也当然会变化。她从一位虔诚的理想主义者渐渐变成了一位现实主义者，她同郎才女貌天生一对的同窗丈夫突然婚变，她闪电般的再婚，她回国后由中央电视台跳槽到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举动，她的肤浅的散文集《凭海临风》的出版，以及《凭海临风》中她与先生不和谐的合影……这些似乎都给了无数爱她知她的崇拜者以迷茫、困惑和失望。虽然这些变化都是在默然中发生的，虽然这些原本绝属私人行为的变化，然而她光彩照人的形象还是迅速发生了骤然的剧变。中央台不请她了，各地方台也少人问津她了，就是在东方台由她主持的每周一刻钟的《杨澜视线》也停播了。

人们似乎淡忘她了。然而，她是个聪慧而富创造性的女人。她尝试写作，居然很快写出了散文集《凭海临风》，并很快出版发行。凭着她的为人、关系、渠道——新闻发布会、名人捧场、签名销书，书销量不少。然而不久，她的处女作虽也有人厚褒，然而更多的是指责、愤怒。有的购书者言词苛刻，说只够中学作文水准，大呼上当受骗……

对此，最近上海文化界专门召集了由著名学者、作家、编辑参加的《凭海临风》研讨会。会上，著名学者余秋雨教授说：杨澜选择了写作这一最收敛、最低调的方式与观众交流谈心，却招来了各种冷言冷语，谣言怪话。他呼吁文化界要吸取教训，要维持好“交通秩序”。作家花建分析杨澜现象时认为：人们对某些明星出书的反感源于某些明星在书中流露的藐视、嘲笑大众的价值观的结果……作家毛时安劝告杨澜，要正确对待《凭海临风》的捧与骂。作家陈林则直言：写作与创作是有区别的。杨澜想更上一层楼，不能老靠自己的生活积累，要在思想创造和文学表现上下功夫才行。专家们的发言是客观的、善意的、也是含蓄的。现在，在上海书市已很难看到杨澜的集子《凭海临风》了，据悉已被人买完。杨澜则把其盈利四十万元捐赠给了贫困地区以建一所希望小学，形象美好的杨澜想用行动证明，她写书并非是为了功利，而是追求一种生命的价值。不过，申城发生的这起杨澜现象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陈冲成熟了

从演电影“小花”而走上影艺圈的陈冲，曾经是令上海女性引以为骄傲同时又是受人非议的具有双重人格的这样一个人物。在上海影艺界，陈冲是第一个只身飞往美国好莱坞演戏；第一个在美国取得“绿卡”；第一个获得令中国人羡慕的“奥斯卡”金奖的中国藉女演员。当获得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合资影片《末代皇帝》在上海首映，当时被人称“性感演员”的明星陈冲出现在大光明影院舞台上的时候，令多少上海少男少女影迷们如痴如醉、鼓掌欢呼。人们感激陈冲终于为中国电影艺术树立了一座丰碑，为上海女性赢得国际级殊荣。

但后来从海外回国的人士那里获悉，上海丽人陈冲闯荡美利坚获得如此成功也实所不易，她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就是有人在美国、日本、港台影院看到了陈冲主演的如《大班》这类描写妓女生活和裸戏影片后才得以被认可，才得以进入好莱坞，才得以取得绿卡，才得以被捧上奥斯卡奖之类的荣耀的。对此，具有传统道德观念的上海知识型女性大多非议陈冲的成功与辉煌其实很不光彩。言下之意，不是艺术才华，而是肮脏的交易。对当时的那种流言蜚语，陈冲一直表示沉默。

最近，陈冲在上海拍戏时坦言：她承认女人在好莱坞是不受重视的。她直言在美国在好莱坞对男女的性，对婚姻关系是极其混乱的。譬如，一个男人三个月还不给同居的女人谈到未来，那就没有未来……

陈冲现在成熟多了。她说她再不会用性去换得事业的成功了。她认为：到处跟人睡觉也并不能赢得机会。于是她看重到国内来求发展的机会。陈冲闲时也写作，她的散文集《对爱不再怀疑》、《小花寻梦》最近已经出版发行，但她没有宣传张扬。仿佛她甘愿做原野上的一朵小花似的，花开花落，一切顺其自然好了。

邬君梅的裸戏风波

原上影厂演员邬君梅和陈冲是同窗姐妹，差不多时间从艺，又差不多时间去闯荡美利坚。邬君梅虽然在国内外演过一些片子，但总感她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不过，最近她演了一部名叫《忧草子》的裸体戏后，在日本、香港、台湾等地区放映后顿时产生轰动效应。今年四月，影片在香港首映后，由于香港媒体不惜笔墨炒作邬君梅如何演裸戏，使远在美国洛杉矶的邬君梅不得不自说经过，刷洗清白。

在这部由英、荷、法三国投资商合拍的名叫《忧草子》的、由英国著名导演彼得·格林纳威执导的日本古典故事影片里，邬君梅演了一场很长的裸体戏。大意是：作为角式和子的情人要在她一丝不挂的身上任意艺术书写。这组全景式全裸戏邬君梅接剧本后一开始就断然拒绝。但她终于挡不住英国导演彼得的名与利的诱惑，她终于在经过了她一生最痛苦的八个月的沉思后欣然接受了《忧草子》的剧本，她终于相信了导演彼得所提示的：你还穿着衣服、皮肤就是你衣服的鬼话，她终于把她自己推向了一个极端。

影片拍好后，邬君梅看后曾屡次恳求删掉裸体部分的戏也遭拒绝。于是，邬君梅在客观上采用了好莱坞女明星惯用的用胴体裸戏来为自己作宣传的从艺之路。

也许是邬君梅真豁出去了，当她得知她主演的《忧草子》在香港放映引起轰动，她也因此而被炒得沸沸扬扬时，邬君梅感觉居然出奇的平静。她认为这是好事，她说她原在香港几乎没人知道，现在由此而片约大增。据悉，眼下她已与三部香港影片签了约。看来，邬君梅还真想一不做二不休了。

这也真应了一位名人对上海女人的说法：上海女人的嬉、笑、怒、骂中，都难免不带有商业的目的。

广告竟然这样创意！

■拍案惊奇 □文／刘兴华

在广告多如牛毛的当今，许多商家为出奇制胜，什么坏点子、孬点子都使出来了，致使不良广告简直成了社会一大公害。

接吻成赛事

“你会接吻吗？你敢公开接吻吗？请你参加接吻大赛！”

二月初，乍暖还寒，由武汉市×娱乐有限公司举办的“浪漫接吻大赛”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选手们各施解数吻起来，有的温文尔雅，一丝不苟；有的如动物般凶猛，狠吞虎咽；亦有的津津有味，吱吱作响。

既然是大赛，就应有奖金。奖金1000大元。接吻，不就是驴唇对马嘴的事吗？屁大的功夫，便有如此丰厚的报酬，真可谓打着灯笼也难觅的美差。许多美男靓女为之心跳，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参赛去！

更多的武汉市民却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故意把“夜幕中的温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仅是对人性的亵渎，也有悖于国情。有些人异想天开，把这当成比赛项目，简直就是丢武汉人的脸。

武汉×娱乐有限公司的老总们可不这样认为，由于该公司这一做法“惊天动地”，成了传媒争相报道的对象，自然名声大振，起到了广告的作用。

国人中总有这么一小部分美、丑不分者，“不上天安门，就进蒋家坟”亦成了这些人的为人处世哲学。

划拳有擂台

酒友们都知道，划拳行令这一陋习，在公共场合早就属禁止之列，并有违者罚款之警告。

河南省鹤壁市一家酒厂于1996年10月27日，竟公开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以划拳比赛作为促销手段。

这次比赛，共设奖63名。其中第一名为拳王，第二名为拳师，第三名为拳手。听起来有如武林高手的竞技，其实个个都是酒囊饭袋而已。

是日，比赛在该市繁华闹市设四个擂台举行，一个个酒肉之徒，堂而皇之地在如织的行人面前喝五吆六，声音如雷灌耳。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这是拍电影呢。当听说这是比赛时，人们不由惊得瞠目结舌：天爷，划拳也敢办比赛？就不怕公安局的人抓你。

该酒厂却不怕，事就这么怪。

天上掉钞票

“天上不会掉馅饼”，这是人们教育那些梦想不劳而获者的一句话。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天上会掉钞票”，你信吗？

“4月6日，市区主要街道上空将有飞机撒下8万元……”

1996年3月中旬，湖北省十堰市主要媒体均在显著位置或黄金时间同时刊出或播发了这则内容相同的广告。

广告称：“公元1996年4月6日中午12时，勇为人先即将登台亮相的十堰市×山庄将雇请民用飞机，准时抵十堰上空，沿人民路飞撒大礼8万元。面额分别为888元、488元、288元、48元、8元、1元，附有×山庄简介的现金兑奖券，敬请十堰市人民届时翘首以待，把握‘财’机！”

“飞撒8万元，捡到的就是钱。幸运的你，幸运的他，幸运的我！”

然而，十堰市市民并非×山庄想象的那样爱财如命。面对这一荒唐无比的所谓创意广告，他们想到的是山区十几万尚未脱贫的父老乡亲，想到的是精神文明建设。他们纷纷致电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对这一荒诞不经的作法坚决制止。

广告上预告

也许有人会问：“有天气预告、节目预告、航班预告，而广告怎么预告呢？”

想预告广告的人自有其办法。明说不行，那就暗吧！

1月25日6时30分，是郑州市民难以忘却的时刻，直到此时此刻他们才明白，自己被报纸、电视台联手涮了一把。在此前，一家报纸在显著位置连续刊发了让广大市民注意收看一家电视台特别节目的消息，这家电视台也多次播发了这则消息，无孔不入的是一些配有BP机的用户，也多次收到了传呼台发布的与上述内容一样的消息，再加上一些不胫而走的传闻，无疑更增添了这一“特别节目”的神秘色彩，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千呼万唤始出来。当市民准时打开电视机，方知这是郑州一家广告公司为一家酒厂策划并付诸实施的悬念广告。

广大市民愤怒了，他们要为自己被无辜戏弄感情讨个说法。在民众压力下，这家报纸不得不在原消息位置连续向读者致歉，电视台自然也不能例外。

有些事仅靠道歉是不够的。

创意广告，你别再离题万里，大众已忍无可忍，请你学会返朴归真！

中国国歌小史

■史海钩沉 □辑文／王志强

清朝以前的我国历代王朝从来没有国歌。直到1906年陆军部成立后，清政府制订了一首陆军军歌，当在海外需要演奏国歌时，就用这首军歌替代国歌。

1911年，清政府制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这首歌名为《巩金瓯》，极力为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同年2月，临时政府的公报上刊出了国歌拟稿，歌词是：“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这首国歌歌词虽然尚不成熟，但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新的民主共和国的热爱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热爱和平，追求文明的愿望，鲜明地体现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胸怀和志向。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的政事堂礼制馆确定了一首名为《中华雄踞天地间》的国歌。歌中唱道：“中华雄踞天地间，廓八埏，华胄从来昆仑巅，江湖浩荡山连绵，勋华揖让开尧天，亿万年。”这首“洪宪”国歌，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大肆鼓吹，竟然把袁世凯比作上古的圣帝尧而且尚鼓吹祝愿袁氏帝制的反动统治维持“亿万年”。历史的潮流毕竟不可阻挡，随着袁氏皇帝梦的破灭，这首国歌便被丢进了故纸堆，从此消声匿迹了。

1919年11月，为了制订新的国歌，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国歌研究会。据说根据章太炎的提议，该会决定把相传上古时代舜所作的一首《卿云歌》配上新乐曲作为国歌。新国歌于1922年1月由北洋政府国务院公布。《卿云歌》总共有四句，十六字：“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首古诗，词意深奥，又缺乏时代气息，不足以表达国民的爱国感情，普通群众抵制情绪很大。

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政府以国民党党歌作为代国歌。这首歌歌词取自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的训词，于1929年作为国民党党歌颂行全国，1930年国民党政府决定以它暂代国歌，1943年作为正式国歌传唱、颂行。

1949年9月2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夕，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订前，暂时以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1978年，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将《义勇军进行曲》配上新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国歌。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从此，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国歌便在神州大地广为传唱，以它雄宏的气势激励着华夏儿女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奋斗不息。

我国最早的出租车

■汽车史话 □文／安广禄

出租汽车出现在我国城市的大街小巷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早在1903年，我国北方号称“冰雪之城”的哈尔滨率先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出租小汽车。那时的哈尔滨是我国北方重镇，内陆交通发达，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居住着许多外国侨民。在这种条件下，一种由个体经营的“营业小汽车”便应运而生了。不过最初的车辆很少，总共还不足10辆。

1908年，上海的美商环球供应公司百货商场开始开设汽车出租部，承揽上海市内的汽车出租业务，出租可乘坐4名乘客的“凯笛勒克”牌小汽车。出租部还装有电话，接受乘客的预约、叫车等业务。北京虽然早在1902年就有了汽车，可直到1913年才由法国人率先开办了全市第一家出租汽车行——飞燕汽车行。广州的出租汽车最早出现在1915年，由马来西亚华侨司机和侨商从香港购入小汽车，经改装后投入运营。

现在，出租汽车已经遍布于我国的大小城市，给广大城市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舒适和方便。

谁先发现烟草致癌？

■你知道吗？ □文／庄子

烟草致癌已成为医学界不争的事实，是谁首先发现并提出这一科学结论的呢？国内外的许多文献资料称“是一位美国科学家”。其实不然，世界上第一位通过动物实验得出烟草致癌结论并公开发表论文的是我国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教授、著名的药理学家吕富华。吕老今年已90高龄，精神依然矍铄，身体仍十分硬朗，记忆还是那么清晰。

1933年，年仅26岁的吕富华从上海同济医学院毕业后，赴德国佛莱堡医科大学留学。当时，保险公司在对死亡者进行赔偿时，发现吸烟者的死亡率比正常人要高出许多，由此保险公司产生疑问：是不是人的吸烟与死亡有关？如果有，那么对吸烟者的保险要慎重些了，理赔金额也应有所调整。

在保险公司的委托下，一些研究人员开始在小白鼠身上做“烟草与癌变”实验，但屡屡失败。吕富华也利用小白鼠作实验，同样遭到失败。后来，他改用家兔做实验，将烟草中的提取物涂抹在家兔的耳朵上，并长期进行观测。结果，他发现家兔耳朵上涂抹过烟草提取物的地方发生了癌变，这一发现令吕富华兴奋不已，他遂将实验结果用德文写成论文《于家兔涂布烟草焦油致癌的研究》，发表在1934年的《法兰克福病理杂志》上。该论文也就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动物实验得出的关于“烟草致癌”的科学报告。

1935年，瑞士人舒尔茨和文特斯坦用同样的方法做实验，发表了同样结论的论文，而且在论文中多次提到或引用了吕富华的研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三位学者的论文都没能引起科学界的多大关注。相反，科学界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科学发现置于了美国人的名下。

在解释这种原因时，吕老说，德语是个小语种，使用的人少，因而人们在查阅资料时，多倾向于英文资料，从而忽视了德文资料。此外，当时正处在“二战”前夕，欧洲局势动荡不安，世界政治空气十分紧张，人们更关心的是战争。在“二战”结束后，德国是战败国，人们对凡是与德国有关的东西都表示憎恨。相反，美国成了世界关注最多的国家，况且英语又是世界通用语言，用英文发表的资料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更多的人关注和引用了。

编写过《临床药理学》中“烟酒药理学”的傅绍萱教授写信给吕老，说“因图书馆藏书有限，加之我工作粗疏，……未能发现您在1934年首次报道烟草对家兔致癌的论文，所以在编写时出现了重大遗漏与失误，实属憾事，也感到对不住您……特表歉意！”对此，吕富华却显得十分大度，他说：“我无意和别人争名夺利，不过，我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工作不被埋没。”

1951年，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到武汉，吕富华教授带头响应第一批来到武汉。在6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吕教授在我国药理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药理学界颇有声望的科学家。